第一章　挥师东进

1.“和平共处”:毛泽东派周恩来出面打嘴皮子仗。蒋介石曾一心想逼毛泽东出洋。15年后,蒋介石痛悔地说“:当初国共合作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历史诉说是非曲直。抗战前夕国共谈判内幕

公元1937年7月7日，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卢沟桥突然爆发的战火，使中国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但从这一天起，屡受挫折的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

8月11日“,火炉”般酷热的南京城,国民政府国防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一天赴会的，除了国民党各路将领外，中国共产党派去了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与国民党共商联合抗日大计。

会议刚一开始，蒋介石便打出了一张王牌。

一直追随蒋介石、以“亲日派”著称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首先站了起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眼光只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脸上一扫就过去了。也许，此时他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中，他这个坚定的“亲日派”在国内外是共知的，从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的讲演中就能看出几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本是个强大的国家,兵力和财力都占优势,而我国民弱兵少,和他们相比,力量过于悬殊,如果抗战,恐怕打不过日本,前途令人担忧。”

本来，今天赴会的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对抗战时机的选择是否适当还拿不准主意，何应钦一番话，先给这次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

周恩来善于察言观色，他见蒋介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不出心里在想什么。而何应钦放了一炮后，蒋介石并未表态，而是悠闲地喝着水。他马上感到，如不立即反驳，将会给决定抗战前途的这次会议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

这些天来，周恩来已感到国民党将领的思想倾向，他们大部分人是希望抗战的，但他没想到何应钦打了一个当头炮。如果让这种悲观情绪弥漫开来，将会给这次的谈判造成不良的后果。何应钦的话音刚落，他马上站了起来。

“日本确实是个强大的民族,在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他们的优越条件。”周恩来说着，语气一转，“但是,日本国度小,资源不足,大部分依赖进口,况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的野蛮被世人所不齿。他虽然和法西斯国家相勾结,但常言说的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注定了它的必然失败。”

“中国的确国弱,军事落后,经济和组织力量都比日本差,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再说，中国进行的是正义战争，会得到国际援助，这是我们取胜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最后抬高了语调,作了总结性的结论“:因此,我们没必要悲观，也没有理由悲观，我们会胜利的。”

周恩来话音一落，会议室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发言后，朱德马上又站了起来，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肯定了抗战胜利的必然性。他说：“也许大家都还记得辛亥革命吧？当时的蔡锷官职很小，而他的对头却是总督、总参议、兵备处总

办等人。他们兵精粮足，武器先进，却在战斗中输给了蔡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人是反动势力，而蔡锷是正义的，所以，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他胜利了。”

朱德话虽不多，但旁征博引，言语生动，也颇有说服力。随后，又有几位国民党的将领发了言。这时，他们也都和周恩来、朱德的态度一样，要求坚决抗战，会场上洋溢着一种从没有过的亢奋之情。

蒋介石好象再也听不进别人的发言了，他表面上很冷静，可心里却暗暗佩服周恩来和朱德。但越是如此，他心中就越沉重起来，他知道自己碰上了真正的对手，他不是日本人，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等人，而是共产党！

他心里打起了鼓，觉得自己至少曾经是低估了共产党，低估了毛泽东。他有些后悔自己的一些作法，甚至有些担心自己会不会偷鸡不成蚀把米。

他心里七上八下地起落着。这个自诩为伟人的蒋先生又一次陷入了彷徨中。因为，他不但看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智慧和谋略，而且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真正可怕的，也许是站在他们身后的毛泽东。

“西安事变”促成了中国内战的停止，但国、共两党的合作仍似云遮雾罩，艰难颇多。

事实上，早在“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就曾有过了多次秘密接触。蒋介石在十年征剿未达目的时，自然希望能利用红军处境艰险的形势，用谈判方法收编红军，溶化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则毅然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前嫌大大方方地坐在了谈判桌前。

1936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又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会谈。

会谈仍是极其隐秘，几乎没有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掀起多少波澜。会上，陈立夫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首先代表蒋介

石对中共提出了如下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目前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开列完条件,陈立夫对潘汉年故作神秘地交底说:“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

潘汉年静静地听着，并没急着表态，睿智的大眼闪动着。听完陈立夫这一席话，他已经意识到南京蒋介石的阴险和对谈判的毫无诚意。这哪里是谈判，简直就是收编。几番交锋后，潘汉年神态严肃、一针见血地对陈立夫说，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确认这是抗日合作谈判条件。

陈立夫指节轻叩桌面，并未否认。也许他认为，此时穷途末路的红军似乎只能接受这一方案。从他那得意的眼神中，中共代表潘汉年预感到此次上海之行得空手而归了。

果然，这之后，潘、陈又有过几次接触，但双方谈判条件相去甚远，会谈不了了之。

“西安事变”谈判中,蒋介石被迫口头上允诺了停止内战。多灾多难的中国，开始渐渐步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境地。在这种背景下，一度搁浅的国共谈判重新开始。

1937 年 2 月至 3 月，周恩来、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南赴西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开始高层的正式谈判。

这次谈判会上，中共代表团提出谈判的基本方针是：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为某路军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军队中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但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共产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可在特别区活动。

以上五点方针表明，中国共产党本着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实际上也作了让步。

2月12日下午，周恩来与顾祝同的面谈使这次谈判活动达到了高潮。会上，顾祝同虽然慑于周恩来的威名和才干，对周恩来礼让有加，但蒋介石的旨意，他丝毫不敢违背，在红军人数这一关键问题死活不做让步。会谈十分艰难。

2月16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指示说，红军人数“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关于干部，“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应由中央派充也。”“其它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别议”。

这种谈判，实际上就是一场互不相让的持久战，对这一点，中共代表团早有思想准备。周恩来只能耐下心来陈情说理、据理力争。双方讨价还价，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初步议定红军可编为三个师，人数相应增加。

3月8日，国、共双方鉴于谈判双方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决定将谈判意见书写成一条总结性条文，上报南京，等待蒋介石的最后决定。考虑到周恩来的威望及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国、共双方代表一致公推由周恩来起草条文。

眼看大局告成，中共代表们一直紧张着的情绪终于松弛下来。但这时，国民党党棍贺衷寒却节外生枝，于3月11日竟然提出将红军缩小至二万余人，并且旧账重提，要求红军改编后，副职干部须由国民党方面派遣。似乎这还不够，又在提案中要求改编后的红军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国民党方面的一切命令。

贺衷寒的这一提案，转了一圈又成了国民党“收编”性的提案，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求中共放弃独立性，变成国民党的附属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阅毕贺衷寒这个出尔反尔的条文，大为愤慨。周恩来对贺衷寒这个昔日的黄埔学生如此没有信义也大为失望。他当即将此事电告陕北中央。

3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主张停止西安谈判;“要求见蒋解决”。并发去一封通过周恩来转张冲的电报,称:“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经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开会。”

由于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时也有意将会谈搁置几天，让国民党代表反省，周恩来便率中共代表团暂别西安。行前，顾祝同、张冲前来送行。也许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敬重，也许是对贺衷寒出尔反尔的歉意,顾祝同临别时对周恩来说:“周主任，此行不管怎么说令顾某思路大开。贺衷寒所提附加案一事本人实在无法苟同。我以为,此次谈判仍可照我们先前商定的办。至于其它问题，不妨由周主任将来赴京时与委员长面谈。”

张冲在一旁连连点头。

周恩来神情坚定地说：“谢谢二位的这句话，我会努力去做的。”

周恩来走了，返回了陕北。西安谈判虽然没能使红军改编问题达成最后协议，但谈判仍向前大大地迈出了一步：红军改编成三个师以及在西安设中共办事处毕竟还是达成了协议。

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国民党对红军的军薪接济从3月份开始。毛泽东及红军与国民党军大战十年后，终于第一次可以从南京国防部领到现洋了。

1937年的阳春3月，中国虽处于日寇大举侵华的前夜，但风云激荡的时局带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应该说还是令人激动的事多些。

转眼间，三个月匆匆逝去。

6月，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再率中共代表团远赴庐山，开始了与蒋介石、宋子文的第一次庐山谈判。

素以“凉岛”著称的庐山，此刻云集了不少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怀揣我党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十三个问题，有备而来。

牯岭,蒋介石行邸。周恩来与蒋介石的私下谈话已有数次。从绥远保卫战到全国的反走私，从当时全国的国防军事财政准备到太平洋整体安全问题，两人几乎无所不谈，海阔天空。

但对大环境的关注，丝毫没有冲淡两人代表各自立场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周恩来据理力争，蒋介石以攻为守，两人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

对周恩来，不知蒋介石是出于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共事的那段交情，还是出于一种惜才之心，说话从来比较客气。今天两人虽然利益不同，争得面红耳赤，但蒋介石还是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耐着性子劝道:恩来呀,你应该体谅政府的苦衷,更应该理解我们的诚意和让步。一国多公，政出多门，如何体现全国的抗战团结，政府的威望又将存于何地？让毛泽东、朱德出洋，考察考察国际形势，宣传宣传中国的抗战，以便将来更好地效力于民族、国家，于国、于个人还不都是好事?!”

蒋介石说着,观察着周恩来的表情,又开口道:至于三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一事，我看实无必要。政治训练处统一三师之政工、训练足矣。机构壅杂,指挥不便,友军也会因此而有闲话的。”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他了解蒋介石实际上是个很小气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对可能的利益是能争一分就争一分。逼朱、毛出洋，在红军即将改编的三个师以上只设政训处，实际上是南京想控制中共、红军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限制中共的独立性。这种原则问题他是不会让步的。

“蒋先生,恕我直言,你对即将改编的红军过于关照了。三师为军。今日红军改编，三个师以上怎么能没有一个指挥部呢？这在国内各地军队的改编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嘛。不论今后成立的这支部队是几路军，设置总指挥部是合情合理的。我党已再三表明，

这支军队是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从事抗战大业，由朱德、彭德怀出任正、副总司令。至于政训处，按照国内友军编制，可以设置，但必须是在总指挥领导之下。”

周恩来以对国内政情、军情的充分了解和犀利的言辞，与蒋介石唇枪舌剑。双方你来我往，久不能决。虽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第一夫人宋美龄以及张冲等要员走马灯似地从中穿梭斡旋，但周恩来绝不后退，蒋介石冥玩不化，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周恩来、蒋介石，这两位十年前的黄埔搭挡，终于没能解开谈判中的怨结。说到底，在抗日战场尚未形成时，蒋介石仍抱着收编红军的幻想。起码在他看来，在中日全面战争尚未爆发时，绝不能让中共和红军轻易地取得合法身份。

6 月的庐山，云遮雾罩。国、共实现二次合作的前景仍象深藏在雾中的庐山一样，变幻不定。但总的说来， 1937 年上半年的国共会谈仍以一定的步伐在向前迈进着。千里之外的陕北高原上，毛泽东关注着时局，对会谈的最终成功充满信心。

7 月初，蒋介石、汪精卫一封封专函飞向全国各地。国民党各方军、政要人如同候鸟一般飞离炎炎酷暑，上了清凉幽静的庐山。蒋、汪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如期举行。在全国一片停止内战的呼声中，蒋介石决心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7 月 13（或 14 日）日，应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率博古、林伯渠等人二上庐山，与蒋介石重开艰难的谈判。

庐山牯岭新一轮论战起前，卢沟桥的枪炮声便惊动天下。七·七事变，日军揭开了大举侵华的序幕。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全国、全世界的目光骤然转向了愈演愈烈的中日战争危机。

7 月 8 日，中共中央率先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天，南汉宸受中共中央委派，以毛泽东和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宋哲元的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向外界表明中共和红军一心抗日的民族之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上海、太原、广西、四川、贵州等地

电讯往来频繁，向各界申明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同时，请求各界领袖及各地实力派努力同政府、同国民党党部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中共此时虽然避居陕北一隅，人不过数万，但鲜明的政治主张、严密的组织纪律以及与蒋介石较量十余年而未屈服所产生的影响，表明毛泽东仍是一位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对手。这一点，是那些拥兵数十万的地方实力人物所无法相比的。这一点也赢得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敬重和支持。

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呼声中，蒋介石终于感到了压力，他有些无可奈何。在他眼里，中共和毛泽东请求开上抗日前线的真诚似乎是想向他的国民党渗透，这更令他不安。但作为政治家，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无法拒绝中共光明磊落的要求，更没法对中共再动手脚。

蒋介石就这么抱着他那个“收编”的梦想苦撑着，他仍在注视时局。在给宋哲元的电文中他也喊抗日，但他的日记里，却是满篇疑问。

中共中央根据局势的发展加紧了攻势。 7月14日,陕北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任务。

同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书，真诚地希望国共能携起手来，共御外敌。

中共中央此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 7月16日紧急电告蒋介石。

据西安行营侯厅长删申电称，关于第三者（指中共）调出参战事，曾与叶剑英洽询。叶并将此意转告肤施（延安），倾得电如下：

一、蒋委员长及政府决心抗日，我们竭诚拥护，愿在蒋委员长指挥下努力杀敌。

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并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

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后。

四、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能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使命。

等密。职意该军之使用，俟正式战争发动时，似可照办。除复电转知前途，予以慰勉外，谨电参考。

职应钦。铣未。参

庐山牯岭。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与毛泽东相斗 10 年，他太了解毛泽东了。那个湖南大个子有着睿智的双眼和精明的大脑，他是不会放过任何时机的，尤其是今天这种有利的时机。

如果全面抗战之局面不可避免，把红军送上前线与日本人交战自然不是坏事。但今天时局扑朔迷离，切不可草率行事，放虎归山。拖！拖拖看再说。蒋介石终于打定了主意。

7 月 17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牯岭行邸再开谈判。谈判会上，蒋介石表示，中日开战后，中共方面的宣言即可发表。这是蒋介石所做的唯一让步。至于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总司令部及设政治部一事，蒋介石任凭周恩来如何力争都不答应，甚至还要求红军改编的这三个师的参谋长须由南京方面指派，并想在三个师的政训主任人选问题上耍花招。

蒋介石一生中收编各地军队无数，但从没象今天这般劳神费力。周恩来看清了蒋介石的花招，严正相告说：国民党方面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我党决难接受。

7 月的谈判仍无结果。周恩来心知好事多磨，未作让步，率中共代表团再次返回陕北。周恩来的辩才虽然出类拔萃，但面对固执己见的蒋介石却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形势一天紧过一天。

7 月底。卢沟桥燃起的战火已烧向整体平津地区，中日全面战

争已迫在眉睫。蒋介石虽然连电宋哲元，让其收起乞求和平的幻想，但蒋介石多年“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迷乱了前方将士的视线，北平和天津，华北大地上的这两座历史名城终于落入日军之手。

一月前中共的愤然呐喊终于成了不幸的现实。

蒋介石叫苦不迭，在最后关头，他终于抛弃了犹豫、观望。7月中下旬，蒋介石在庐山语气悲壮地宣称：“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立场和方针。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心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蒋介石在日军无止境的步步进逼和国内外铺天盖地抗日浪潮的推动下，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毅然摒弃了妥协政策，决心操起抗日平倭之剑，回击日本的野蛮侵略。

8月13日，举世瞩目的淞沪战火爆发。淞沪抗战的爆发，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国民党军在南京政府的指令下奋起抗战。

南京谈判桌上，蒋介石终于再无回旋余地。此前，蒋介石早有允诺，一旦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就向全国发表中共宣言，在全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这种时候，面对周恩来锐利的双目，蒋介石又耍了最后一次花招。

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谈判代表康泽提出要修改中共宣言，蒋介石居然当着应邀前来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代表的面应允了康泽。

中共对此断然拒绝。周恩来明确告诉蒋介石，中共决不接受康泽的提案。

面对日军凶猛进攻的强大压力和国内震天的抗日呼声，为了早日能把红军派上抗日前线，蒋介石最终叹口气，全面接受了中共方面所提的军事条件。

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最后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统辖三师六旅十二个团,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为促使红军早上抗日前线，蒋介石甚至答应说，国民党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从排副到副师长，所有人选都由中共自行指派，南京政府对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三个师仅各派一名联络参谋。

当晚的庆祝宴会上，蒋介石与周恩来碰过杯后，不胜感慨地说:“恩来呀 红军改编一事政府已全力满足了你们的要求。今后抗日大局，全赖你们鼎力支撑，望贵党、贵军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蒋先生尽可放心,我党抗日救国之心已明昭天下,愿在先生领导之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竭尽全力。”

周恩来的话,激起满堂掌声。蒋介石笑了,但从他的眼中,周恩来似乎仍看到了丝丝不安和忧虑。

9月 22 日，南京中央社向全国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首次告之国人中共‘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此举，对国民党来说，摆出了一个国家、民族胜于一切的高姿态。对中共来说，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蒋介石对中共和红军承认也承认了，此时自然不愿放过一个抬高自己、团结国人的良机。9月 23 日，蒋介石就公布中共宣言一事发表谈话，称“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甚至向全国表示 国共双方‘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

蒋介石不愧为玩弄政治游戏的高手，洋洋一番讲话，活脱脱地塑造出了一个“民族伟人”的形象，同时也给自己手下的各地将领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今日连共产党都合作了，抗日之举绝不再是姿态，而是实实在在动真格的了。

国、共两党在历经 10 年的波折坎坷后二度合作，国共统一战

线终于在日本侵略军的枪炮声中正式形成。

当历史沉淀了五六十年之后，再回首，无论人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定了格的那段历史，都觉得当时的国、共“和平共处”是历史的必然。事实上，在国、共对立的 28 年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竟不及“和平共处”的时间长。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外敌的入侵，国、共第二次联手，又有谁能怀疑呢？

西安事变十五六年后，当蒋介石败出中国大陆时，曾痛悔地说：当初的国共合作，实则上了共产党的当。言外之意，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国共谈判,共产党也许早不存在了。这句话,在一定的时期内确曾迷惑了不少人。但当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历史时，一切便又明白了。为什么蒋介石从 1935 年开始就秘密寻找与共产党谈判？张学良如果不是发现了蒋与中共秘密谈判，如果不相信中共有抗衡蒋介石的力量，他还会冒险发动“西安事变”,与中共结盟？退一步说,“西安事变”结束后,如果蒋介石有力量和决心，他何以要留下这无穷的隐患？他又怎会在谈判中最后让步？

说到底，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历史不能再重来，但每一段历史都有自己清晰的脉络。不管怎么说，国共谈判的成功，使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

2. 洛川会议,铁军诞生。贺龙豪气大发地说 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闹他个天翻地覆。贺龙为人仗义,给中央留钱留人

7 月中下旬，华北的形势一天紧过一天。日军得寸进尺，丝毫没有让步休战的意思，反而提高了谈判价码，这使得中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满怀忧虑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8月13日，战火终于又燃向上海。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指挥国民政府军嫡系部队，英勇抗击着日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帷幕终于全面拉开了。

与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抗日高潮相呼应，陕北各地红军频频集会，加紧改编，积极练兵备战。陕北各地，一片秣马厉兵的备战景象。此时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一事虽然尚未达成最后协议，但大势所趋，使毛泽东和红军将领们认定，红军改编、开上抗日前线是形势的必然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7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云阳镇红军总部召开了红军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所以决定召开这次高干会，是在认定国共将实现合作的情况下，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会议的气氛还是热烈、甚至令人激动的，这毕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历经十年低潮后再次出现的轰轰烈烈的新时代。到会的每一个红军将领无不为这令人鼓舞的新形势的到来，为老战友的久别重逢而振奋。会议由任弼时主持，重点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紧张而热烈的讨论：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意义与任务；改编后的思想政治工作。

会上，各路将领发言踊跃，畅所欲言。

会场一角，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听着众人的发言，笑咪咪地不时向身旁的政委关向应投去会心的一瞥。这一天的到来，对他可以说是未曾想到的。10年前，当他放弃了国民党军长的高位，率部参加南昌起义而脱离国民党时，决没想到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一天还会再“统一”到国民政府军的序列中。但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做了十年对头的贺龙，此刻更关心的是率部奔赴抗日前线，杀敌建功。

会场上，贺龙站起来发了言。他首先表态说：我拥护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是不允许动摇观望的。我们红军自己抗战，也要促使蒋委员

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

说着，贺龙眼望众人，话锋一转道：“但是，他们这些大资产阶级、地主官僚、军阀政客中的有些人，对抗日动摇不定。说不定，他们还会同日本人勾结。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对抗日的捣乱和破坏。依我看，国共两党总是达不成实质性协议，是因为蒋委员长现在正处于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象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但同时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我们红军。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贺龙的话通俗易懂，不乏幽默，说的与会众人咧嘴欢笑。但笑归笑，众人却不得不承认，贺龙的话，一语道破了蒋介石迟迟不愿在红军改编协议上签字的原因。同时，贺龙风趣简洁的发言，更让人感到他有种急于奔赴抗日前线一展身手的冲动。

当时，贺龙确是力主抗日、早上前线的。他是一个从刀丛血雨中滚打出来的军人，前线隆隆的枪炮声对他有着特殊的诱惑力，战场上的硝烟能让他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感觉。此前，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日本人调兵十万来华，他知道。国民党战和不定、甚至有人高唱“战必败”的论调，他也知道。他感到中华民族真正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民抗日，共驱敌寇，保我民族的意识激得他有一种迫不及待地要冲上前线去的冲动。他打过十多年的仗了，但与外敌拼杀，直接为国家、为民族效力，还是第一次。

贺龙似乎有些急不可待。这次会议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私下里向他透话说：军委有意将陕北红军第 27、第 28 军编入红二方面军，接受改编，以便对日作战。贺龙听了大喜，会议休息时，一得空便找红 27、28 军来开会的主要干部，东聊西扯，问得十分详细，从部队的发展、干部的情况，到部队的作战特点、装备情况，凡是能想到的，几乎都问到了。

贺龙的这股子急劲，弄得随他一同前来开会的政委关向应直

乐，问贺龙道“:云卿(贺龙字),你找他们做什么?”

“了解点情况。对他们,我过去不太了解,怕自己心中没数呀!”贺龙说。

关向应听着更觉乐了，说：“云卿，事情还没明确，你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点？前总还没决定呢!”

“嗨。老关啊，走快点比走慢点好啊!”贺龙回答说。

高干会开了四天。会议一结束，贺龙、关向应没有逗留，马不停蹄地星夜往回赶。改编在即，部队里要干的事儿太多了。

7月末，中共中央决定，主力红军迅速改编，做好出师抗战准备。8月中旬，红27军、红28军陆续开到庄里镇，由贺龙、关向应主持进行并入红二方面军的改编工作。

改编，对于严酷战争形势下的红军来说，是件家常事。那年月，红军千里碾转，又作战，又行军，部队伤亡大，兵员补充困难，不得已只能靠部队内部的改编来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对红军来说，这种变化似乎已不足为奇。今天军编成师，明天师编成团，甚至把几支部队弄到一起来个合编。当时哪一个红军官兵没有经过几次改编呢？但是，这次改编却与以往的改编大为不同。

最为不同、给改编带来最大阻力的，是部队改编后的称谓。“红军”叫了10年，可以说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称号，如今却要变了，而且要变为国民革命军。连头上戴着的红五星也要取掉，而改戴青天白日帽徽，穿国民党军的军装。红军官兵个个苦大仇深，和国民党军打了十年仗，一看见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本能的反应就是憎恶、是仇恨，恨不能马上搂枪机、上刺刀。可今天到好，自己也要戴“白帽徽”，和“白狗子”的模样相同，这个弯子实在难转。于是，牢骚、怪话成堆，不少基层干部也转不过弯。整个部队情绪波动很大，有的人索性留张条子，走了，并且理还很充分：死也不当“白狗子”。

对于这一切，高层领导了解得一清二楚。彭德怀在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说：“改编以后，我们红军就要编入国民革命军

的序列，要穿灰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徽了。不戴行不行？不行！蒋介石是作为共同抗日条件提出来的。他是逼着我们戴呢！对这点非原则问题，我们也得妥协一点。合作抗日嘛！”

庄里镇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官兵们热爱红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抗战在即，这么下去于改编工作、于军心的稳固都大为不利。几个人一商量，决定主要领导分头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做好思想工作。

一天，贺龙来到了一个连队。连部里，贺龙望着早已做好接待准备的代理连长和指导员，开口道：“说说看，现在战士们情绪怎样？”

连队干部想了一下说：“我们连普遍存在两个不愿意。”

“噢？两个不愿意？哪两个？”

“一不愿意住下来练兵，想打仗，认为练兵没有用。但经过这几个月的训练，这个问题看来解决了。第二个不愿意，主要是红军改名。大伙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全民抗战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非要红军改名呢？红军改了名，戴了白帽徽，这不成了白军了吗？这个问题至今还没弄通，我自己也不通。”代理连长快人快语，连自己的想法也在总指挥面前连锅端了出来。

贺龙就喜欢这样的人，喜欢这种痛快。略一沉吟，他说道：“你说的情况有代表性。红军改名我也不愿意，你们团长大概也不愿意。”贺龙这时话锋一转，“可是，同志们，这不行。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使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戴白帽徽。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合作抗日哟。”

说着，贺龙点燃了手中的烟斗，进一步启发道：“难道红军改了名就不是红军了？这不对。红军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